



薪火集

王博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薪火集

王博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薪火集/王博编.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.4

(北大哲学系系庆丛书)

ISBN 7-301-07149-3

I . 薪… II . 王… III . 哲学—文集 IV . B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436 号

书 名：薪火集

著作责任者：王 博 编

责任编辑：文史编辑部

标准书号：ISBN 7-301-07149-3/B·0276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：z 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 版 者：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：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50.75 印张 800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65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

序

哲学作为人类追求智慧的象征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，都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。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它的形态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改变，但是追求智慧的本质却从未改变过。这种本质表现着人类最基本的冲动，他们想了解宇宙，了解社会，了解人生，了解自己。只要这种冲动不消失，哲学就永远有着它存在的理由。

中国人使用哲学一词来称呼一个学科，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情。大学里设哲学系，就更晚一些。中国最早的大学是京师大学堂，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（公元 1898 年）。民国元年，即 1912 年，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，哲学门应运而生。这可以说是哲学系创设之始。1914 年，哲学门招收了第一届学生，如果从这算起的话，今年（2004 年）正是哲学系创建九十周年。

北大哲学系的历史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。最初的时候，哲学门虽然名义上有中国哲学门、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三个方向，但实际上只有中国哲学门。经过九十年的发展，哲学系现在已经拥有中国哲学、西方哲学、马克思主义哲学、美学、逻辑学、伦理学、科学哲学、宗教学等八个学科，九个教学研究室。在 2003 年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开展的全国哲学学科评比中，北京大学哲学系名列第一，这充分表现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地位。

为了庆祝哲学系创建九十周年，系庆委员会决定由本系在职和离退休教师每人提供一篇论文，编纂一本哲学论文集。各位老师提供的文章，既有旧稿，也有新作，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哲学系二十多年来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轨迹。这里有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沉思，方法论的探索，也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省。系庆委员会在此感谢各位老师的 support 和配合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有部分老师的文章未能提交，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。

目 录

序 /1

中国哲学

- 中国哲学中的心物问题 张岱年 /3
谈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 朱伯崑 /10
走出“中西古今”之争 会通“中西古今”之学 汤一介 /16
吴宓先生的文化观点 郭兰芳 /28
中国兵家与儒、道、法各家的兼容与互补 张文儒 /37
老子道家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许抗生 /47
中国近代耶佛互补思想 魏常海 /57
范缜《神灭论》在儒佛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 李中华 /68
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断想 王守常 /80
罗素《哲学问题》(1912 年)及其
 在华演讲《哲学问题》(1921 年)之异同考,胡军 /89
世纪末“中国哲学”研究的挑战 陈来 /103
程明道之“生之谓性”及其歧解 张学智 /114
论《十大经》中的“黄帝”形象
 ——道家传统中的内圣外王理想 王博 /125
物境之开敞:以无为用,或天地之心 杨立华 /138

1

西方哲学

- 中西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影响 张世英 /151
形而上学的情结 朱德生 /166

- 沈有鼎与胡塞尔的现象学 新希平/171
逻辑和形而上学的起源 赵敦华/192
《论语》“学而时习之”章析读 张祥龙/204
康德批判的形而上学 韩水法/214
狄尔泰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 李超杰/227

马克思主义哲学

- 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黄楠森/241
“温州模式”及其对我们的理论启示 施德福/250
“一国两制”
——祖国统一的战略决策 宋一秀/263
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探索复杂性 赵光武/272
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、历史观
和具体历史理论概念含义的辨析 陈葆华 米桂山/281
关于人道主义研究和教育的几个问题 张翼星/289
人学——21世纪的显学 陈志尚/297
21世纪科学哲学展望 冯国瑞/306
《莱茵报》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性质 赵常林/319
准确把握马恩著作中未来社会名称的含义 赵家祥/327
对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再认识 杨武栓/336
21世纪哲学创新论纲
——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形态论 王东/344
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郭建宁/353
论社会进步及其评价尺度 丰子义/364
论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及其逻辑基础 曾志/375
生态文明蕴涵的科学与人文价值 徐春/388
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
——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 聂锦芳/398
读者批评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 张立波/412

宗 教

- 关于原创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 杨 适 / 421
发扬人文精神 建设人间哲学
——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 楼宇烈 / 427
佛教阿含类经中记述的“六师”思想 姚卫群 / 438
评张萱清真馆本《云笈七签》 王宗昱 / 448
理性是什么?
——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范畴 张志刚 / 459
对赵紫宸的人格主义思想及道德神学的探讨 吴玉萍 / 474
东正教的“神人之际” 徐凤林 / 491
试论王岱舆“真一哲学” 沙宗平 / 501
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宗教讨论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运思路向 孙尚扬 / 512
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李四龙 / 523

美 学

3

- 儒家思想与中国艺术 葛 路 / 533
书画同理同法
——从写意花鸟画的写与意谈起 高克地 / 541
体验·反思·思辨
——关于美学方法论问题 阎国忠 / 549
歌德的美学思想 李醒尘 / 567
关于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的建议 叶 朗 / 575
艺术美在宗白华美学中的地位 张中秋 / 579
魏晋玄学与“中国艺术的自觉” 章启群 / 588
上帝的棋局
——有关魏玛征文的一则寓言和哲学讨论 王锦民 / 603
现代京剧是京剧的异花变种 颜品忠 / 613
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及其问题 彭 锋 / 625



逻辑学

- 辩证思维质疑 宋文坚 / 653
集体认定中的不一致和合取原则 刘壮虎 / 662
推理、推理模型和推理语义 周北海 / 672
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 陈 波 / 682
王浩的概念论与直谓主义 邢滔滔 / 693

伦 理

- 论“礼失而求诸野”
——儒学传统与时代车轮 周辅成 / 705
儒家伦理、道德层次论的启迪 魏英敏 / 712
超历史分析法：伦理学的发现方法 王海明 / 720
儒家的平等观及其制度化 何怀宏 / 730
人文价值与企业管理 陈少峰 / 741
第一人称哲学的局限 程 炼 / 749

科学哲学

- 科学与伦理价值 李国秀 / 761
毛将焉附
——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冀建中 / 776
技术与人文 吴国盛 / 787
非线性动力学混沌与操作因果律 刘华杰 / 798

出版后记 / 803

中 国 哲 学

中国哲学中的心物问题

张岱年

心物问题，亦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，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。在西方近代哲学中，关于精神与物质的问题讨论较多。在中国先秦哲学中，对于心物问题已有所讨论。到中国近古时代（宋元明清时代），许多哲学家更对心物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。所以，应该承认，心物问题是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。

心亦即主体，物亦即客体。但是主体客体的名称是古代所未用的。在古代哲学中，与主体相当的名词是“己”，与客体相当的名词是“物”。《中庸》云：“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”。己与物即主体与客体，亦称为内外，《中庸》又说：“合外合之道也”。外即客体，内即主体。近几年来，有些论者认为，中国哲学专讲“天人合一”，而忽视“主客”之别，其实并不符合事实。中国哲学确实强调“内外”的统一，但也承认内外的区别。

在西方哲学中，哲学史家常将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与思维与存在的问题联系一起来讲，或将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归并到思维与存在的问题。这是因为，西方哲学中所谓“理念”或“观念”往往是与思维有密切联系的，所以哲学史家将关于“理念”的问题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问题。而中国古代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。在中国哲学史上，大多数哲学家（佛学与陆王学派除外）认为所谓“道”、所谓“理”是客观性的，因而“道器”问题、“理气”问题与“心物”问题是并列的问题，不能相互归结。因此，本文仅述中国古代哲人关于心物问题的见解，而不涉及理气问题。

在先秦哲学中，首先谈到心物关系的是孟子。孟子说：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，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这是说，耳目等感官经常为“物”所引而受蔽于“物”，而“心”具有思的作用，是不受“物”之蔽的。这将心与物对立起来，而耳目居于心与物的中间。孟子所谓心是何所指呢？孟子引述孔子曰：“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惟心之谓与？”（同上）可见所谓心不是指心脏而

言，而是指内在的思维作用。心脏是没有出入的。

《管子》书中《心术上下》及《内业》中亦提出关于心与物的学说。《心术上》云：“心之在体，君之位也；九窍之有职，官之分也。心处其道，九窍循理。……毋先物动，以观其则；动则失位，静乃自得”。这也是认为，心在内，物在外，而感官居其中间。进而提出静因之道：“有道之君，其处也若无知，其应物也若偶之，静因之道也”。更解释所谓静因之道说：“因也者，无益无损也。以其形因为之名，此因之术也。……因也者，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”。这所谓静因之道，用现在的名词来说，即是客观的态度、客观的方法。《心术下》云：“无以物乱官，毋以官乱心，此之谓内德。”这强调心的安静，不要受外物与感官的扰乱。

《心术上》更提出“所以知”与“所知”，宣称，“人皆欲知，而莫索其所以知，其所知，彼也；其所以知，此也。不修之此，焉能知彼？”（从王念孙说校改）所谓“所以知”，即能知，亦即今天所谓主体；所谓“所知”即所认识的对象，亦即今天所谓客体。《管子》明确地做出了主客之分。

《管子》又提出“心中有心”之说，《心术下》云：“心之中又有心”。《内业》云：“我心治，官乃治；我心安，官乃安。治之者心也，安之者心也。心以藏心，心之中又有心焉。”这所谓心中之心，即谓心是能认识自己的，心不但能认识外物，而且具有自我认识，心具有自觉。《管子》书中关于心的理论可以说是比较详明的。

在先秦哲学中，论心最详的是荀子。荀子亦以心为耳目等感官之君，他说：“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，夫是之谓天官，心居中虚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谓天君。”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又说：“凡同类同情者，其天官之意物也同，……心有征知，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，缘目而知形可也，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，然后可也。”（同上《正名》）这是说心有较感官更高级的认识作用，但又必以感官所提供的印象为依据。荀子提出“虚壹而静”的内心修养，他说：“人何以知道？曰心。心何以知？曰虚壹而静。……人生而有知，知而有志，志也者，臧也，然而有所谓虚，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，谓之虚。心生而有知，知而有异，异也者，同时兼知之。同时兼知之，两也，然而有所谓一。不以夫一害此一，谓之壹。心卧则梦，偷则自行，使之则谋，故心未尝不动也，然而有所谓静，不以梦剧乱知，谓之静。……虚壹而静，谓之大清明。万物莫形而不见，莫见而不论，莫论而失位。”（同上《解蔽》）人能做到虚一而静，就能对于万物无所不见了。荀子所谓“虚一而静”的观点可能受到《管子》“静因之道”的影响。荀子又讲：“凡以知，人之性也；可以知，物之理

也。”(同上)这分别了“以知”与“可以知”。这所谓“以知”即《管子》所谓“所以知”，这所谓“可以知”即《管子》所谓“所知”，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区别。

先秦时代，老、庄以“道”为世界本体，《周易大传》以“太极”为世界本体，《管子·心术》以“精气”为世界万物的本原。先秦哲学中关于心物的讨论并不涉及本体论问题。先秦哲学中所谓物指万物而言，荀子：“故万物虽众，有时而欲遍举之，故谓之物。物也者大共名也。”而所谓心则指思维之官，孟子：“心之官则思”。先秦哲学中关于心物关系的讨论不是关于世界本原的讨论，但是，心是指内在的主体，物是指外在的客体，这还是比较明确的。

两汉之际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，到东晋南北朝时代，佛教逐渐兴盛起来。佛教一方面宣传灵魂不灭、三世轮回的迷信思想，另一方面又倡导“唯心唯识”的主观唯心论。一部分中国学者反对这外来的宗教，南朝的范缜著《神灭论》批驳佛教的神不灭论。但到隋唐时代，佛教却更加兴盛。韩愈反佛，亦未从心物问题来批判佛家的主观唯心论。第一个从哲学基本问题上批判佛教主观唯心论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(亦称张横渠)。

张载批评佛教道：“释氏不知天命，而以心法起灭天地，以小缘大，以末缘本，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，真所谓疑冰者与！”(《正蒙·大心》)又说：“释氏妄意天性，而不知范围天用，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。明不能尽，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，蔽其用于一身之小，溺其志于虚空之大，此所以语大语小，流遁失中。其过于大也，尘芥六合；其蔽于小也，梦幻人世，谓之穷理，可乎？”(同上)这主要是从心及感官与天地日月的关系立论，天地是大是本，人心是小是末，而佛家反以为心与六根是天地日月的因缘，甚至以为天地日月都是幻象，这是根本错误的。横渠坚决肯定了天地日月客观世界的实在性。

张载又论心物关系说：“人体无心，因物为心。若只以闻见为心，但恐小却心。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。如只据己之闻见，所接几何，安能尽天下之物？所以欲尽其心也。”(宋本《张子语录》)这断言“人本无心，因物为心”，意谓心乃是物的反映。人的见闻有限，天地之间事物无穷，须尽量了解天下之物，不以见闻为限。但是如何才能尽天下之物呢？张载似乎是认为，“尽其心”就能“尽天下物”。这就从唯物的观点转向直觉主义了。横渠又说：“理不在人皆在物，人但物中之一物耳。”(同上)这又坚持了唯物的观点。张横渠在本体论上提出了“太虚即气”、“虚空即气”、“凡有皆象也，凡象皆气也”的气本论，开创了中国近古时代唯物论传统，将心物问题与本体论联系起来，

其理论贡献是显著的。

张横渠认为“理不在人皆在物”，程明道（颢）与程伊川（颐）却将“理”提到人与物之上，认为“理”是天地万物的本原。二程以“理”为最高范畴，着重讨论了理与心与性的关系问题。程明道认为心即是理，亦即是天，宣称“只心便是天”，表现了主观唯心论的倾向。程伊川认为性即是理，“性即理也”，而将心与天区别开来，宣称：“释氏本心，吾儒本天”，建立了唯理论的体系。二程承认万物的实在性，但是没有着重讲心物问题。

朱熹继承二程学说，却注意心与物的相互关系。朱子在《大学章句》中说：“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这以“人心”与“天下之物”、以“众物之表里精粗”与“吾心之全体大用”对举，显然是认为心物关系是相当重要的。但是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，理（太极）是最根本的，气是次根本的，有理有气而后有心，而物也是理气结合而后生的，物的存在有待于理与气而无待于心。朱子强调了理与气与物的客观存在，这是朱学的特点之一。

与张、朱相反，高度肯定心的作用，而否定物的客观实在性的，是王守仁（号阳明）。王阳明论心与物的关系说：“身之主宰便是心，心之所发便是意，意之本体便是知，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，即事亲便是一物；……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物。”（《传习录》）所谓物只是意之所在，即意识的对象，而不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。阳明又说：“虚灵不昧，众理具而万事出。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事”。“心外无物。如吾心发一念孝亲，即孝亲便是物。”（同上）这说如意在于孝亲，则孝亲便是一物。孝亲之事确实不能脱离意识而存在，但所孝之亲是否即只是意之所在呢？这在阳明哲学中是避而不谈的。阳明以心统摄一切，他说：“夫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在性为善，因所指而异其名，实皆吾之心也。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义，心外无善。”（《与王纯甫》）按“义”与“善”指人类的道德准则，确是有待于心的。事物是认识的对象，范围很广，如“孝亲”之事，确实是意之所在，但所孝之亲是客观存在的。至于天地万物更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。王阳明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贡献的，但是否认天地万物的客观实在性，就陷于主观唯心论的谬误了。

明代末年，方以智著《物理小识》，亦谈论心物问题。方以智认为，一切都是物，事亦是物，心亦是物，而物亦是心，提出心物不二的观点。他说：“盈

天地间皆物也。人受其中以生，生寓于身，身寓于世，所见所用无非事也，事一物也。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，因表理以治其心，器固物也，心一物也。深而言性命，性命一物也，通观天地，天地一物也。”（《自序》）这是说，大而天地，深而性命，外在的器，内在的心，都可谓物。又说：“天地一物也，心一物也，惟心能通天地万物，知其原即尽其性矣。”（《总论》）又说：“舍心无物，舍物无心，其冒耳。”（同上）“日月星辰，天悬象数如此，官肢经络，天之表人身也如此，图书卦策，圣人之冒准约几如此，无非物也，无非心也，犹二之乎？”（《天类》）这既肯定心亦是物，又认为物亦是心。所谓“心一物也”，（这里“一”字是“全是”之意，不是“一个”之意。）意谓心也是客观存在的。所谓“无非心也”意谓一切都是心所认识的，亦即“惟心能通天地万物”。从方以智的上下文来看，他所谓“无非心也”并不是说一切都不能离开心而存在，而是说一切都是可以认识的。但是如此表达，究竟是不准确的。唯物论者认为“舍物无心”，“无非物也”；唯心论者认为“舍心无物”，“无非心也”，方以智企图把两者综合起来，未免陷于模糊含混、语意不明了。

在《物理小识》中，方以智批评了以理为本与以心为本的学说，他说：“本末源流，知则善于统御，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。”（《总论》）又说：“彼离气执理，与扫物尊心，皆病也。理以心知，知与理来，因物则而后交格以显，岂能离气之质耶？”（《天类》）这些话坚持了唯物论的观点。但方氏晚年学佛，受佛学影响较深，于是转入唯心论了。他的晚年著作《东西均》是一部唯心论的著作。

《物理小识》中提出了关于脑髓的说明，他说：“至于我之灵台，包括悬寓，记忆今古，安置此者果在何处？质而稽之，有生之后，资脑髓以藏受也。髓清者聪明易记而易忘，若印版之摹字；髓浊者愚钝难记亦难忘，若坚石之镌文。”（《人身类》）这以脑髓为灵台之所在，虽未明说脑是心的器官，而以脑为记忆力之所系，则无异于认为脑是心之所在了。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。

在近古时代的哲学家中，论心物关系最详的是王夫之（亦称王船山）。王船山论析了己与物、能与所、心与感官的关系问题，从不同方面批驳了唯心论观点。船山论己物关系说：“且夫物之不可绝也，以已有物；物之不容绝也，以物有己。已有物而绝物，则内戕于己；物有己而绝己，则外贼乎物。物我交受其戕贼，而害乃极于天下。况夫欲绝物者，固不能充其绝也。一眠一食而皆与物俱；一动一言而必依物起。”（《尚书引义》卷一）己与物虽然是有区别的，然己亦有物，物亦有己，主体亦不可能离开客体而存在的。船山认

为，不但自然现象可谓为物，人类生活中的精神现象也可谓为物，他说：“天之风霆雨露亦物也，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，则其为阴阳为柔刚者皆物也。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，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，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。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，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，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。”（同上）一切皆物。即是说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。船山进而论能所关系说：“境之俟用者曰所，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，能所之分，夫固有之。……乃以俟用者为所，则必实有其体；以用乎俟用而可以有功者为能，则必实有其用。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，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。……乃释氏以有为幻，以无为实，惟心惟识之说，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。”这对于所谓能所的意义加以分析，从而批判了佛家惟心惟识之说。船山断言：“所孝者父，不得谓孝为父；所慈者子，不得谓慈为子；所登者山，不得谓登为山；所涉者水，不得谓涉为水。”（以上《尚书引义》卷五）这明确区别了认识活动与认识对象。“所孝者父，不得谓孝为父”，正是对于王阳明“如意在于孝亲，则孝亲便是一物”的驳诘。船山关于能所的结论是：“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，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。所不在内，故心如太虚，有感而皆应；能不在外，故为仁由己，反己则必诚。”（同上）以内外分别能所，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。

船山又论心与五官的关系说：“一人之身，居要者心也。而心之神明，散寄于五藏，待感于五官。肝脾肺肾、魂魄志思之藏也，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。无目而心不辨色，无耳而心不知声，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，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。”（同上卷六）这是对于唯心论者贵心而贱耳目的观点的反驳，这对于批判唯心论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。

船山在畅谈“己物”关系时也说过“心无非物也，物无非心也，其上下文是：“故以知帝尧以上圣之聪明，而日取百物之情理，如奉严师，……成盛德、建大业焉。心无非物也，物无非心也。故其圣也，如天之无不覆帱，而后德九族百姓黎民草木鸟兽咸受化焉。”（同上卷一）从上下文来看，所谓“心无非物，物无非心”是说帝尧对于百物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乃是指一种最高的认识境界，而非讲心物不分。

以上略述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心物关系问题的典型论点。最后，应该补充说明在中国古典哲学中“物”的观念与唯物论的关系及心的观念与主体性思想的关系。

在中国哲学中，唯物论的要旨不仅在于肯定物的客观实在性，而更在于肯定物的基本元素“气”是天地万物的本原。气的观念起源很早，西周末

年的伯阳父已谈论“天地之气”。战国时代,《庄子》书中提出“通天下一气耳”的观点。宋代张横渠建立了以气为本的本体论。按气的观念含义比较复杂,应该区别“哲学的气概念”与“常识的气概念”。常识中所谓气指一切可见的现象,如云气、呼吸之气以及精神气象等等。哲学的气概念则专指有广袤而能运动的存在。西方古代唯物论的基本概念是原子,中国古代唯物论的基本概念是气。这也是中西哲学的区别之一。

中国哲学中所谓心主要是指主体自觉性。荀子说:“心者形之君也,而神明之主也,出令而无所受令”。这充分表达了心的主体自觉性。王阳明提倡“心学”,其宗旨在于高扬人的主体性。但是人的主体性与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并无矛盾。唯心论者不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,便陷于谬误了。王船山既肯定能知“实有其用”,又肯定所知“实有其体”。这才是正确的。